

姜德明的散文视野宏远，寄意遥深，叙事委婉，落笔清俊。他在当今文坛已是具有独特风格的散文作家。

王府井小集

姜德明



四季文丛

在这本散文集中，他以饱满的诗情表达了对生活过二十年之久的王府井的怀念，回忆了许多当代知名作家的故事，记述了不少新旧北京的掌故知识。

四季丛书

王府井小集

姜 謐 明

作家出版社

王府井小集

作者：姜德明

责任编辑：潘 静

责任校对：罗静文

装帧设计：尹凤阁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印张：9 插页：4

字数：140 千

版次：1988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072—9 / I · 71

统一书号：10248 · 0244

印数：0001—3,100 册

定价：1.60 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 前 记 •

我曾经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生活了三十年。

我的青春是在这条街上消失的。我对它满怀眷恋，我对它熟悉而又新鲜。

我在这本书里写了好几篇关于王府井的轶事（即使不是专写它的，也都留下了那个时代和这环境里的影子），也许今后还会写到它。书名用《王府井小集》，在我觉得很亲切，正可寄托我的某种感情。也许别人会感到平平常常，我却觉得它富于诗意。请读者原谅我的这一偏爱。

编书的过程中才发现，我未能免俗地写了这么多议论散文创作的文章。说良心话，这几乎都是奉命之作，没有什么高论，只是写出了心里所想的，也没有考虑到文章的格式，不知还能让人看得下去吗？如果没有没什么大错就好了，偏见也许是难以避免的，聊作一家之言吧。

谢谢花钱买了这本小书的读者，我想起巴金同

志说的，是读者养活了作家。我相信这个理儿，怕的是不值，让您白白破费了。

作 者 1987年8月

• 目 次 •

前 记.....	1
王府井.....	1
值 班.....	8
写 戏.....	13
戏 单.....	19
戏 票.....	22
卖书记.....	25
烧书记.....	32
“无名书斋”	38
妻与子.....	41
抹不掉的记忆.....	48
想见冰心.....	52
一片绿叶.....	61
李一氓藏书.....	68

沽上听歌记	72
忆莫桂新	77
逛琉璃厂	81
一年间	86
在海边，艾青说	94
慢亭山房	104
神秘的船棺	109
上海的魅力	113
沪上草	118
上海十日	133
书 友	145
有竹人家	149
听风楼主	151
诗人，歌吟之不足了吗？	153
萧乾的散文	156
读《阿朗小品》	158
读孙犁的散文	161
谈散文的哲理	170
散文的选题	177
散文的细节	186
谈游记	192
记者与散文	197
“半文半白”	206

与香港友人书	210
读一篇散文	213
意外所得	215
散文三议	218
编完《北京乎》之后	224
《南亚风情》后记	232
《清泉集》后记	238
《雨声集》后记	240
《绿窗集》后记	242
《寻找樱花》后记	244
偏爱写人	253
《长短录》的始末与功“罪”	256
《长短录》余话	269

• 王 府 井 •

离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已经六年了。

我在这条街上经历了三十个春秋。现在一经过这里，抬头望望工作过的大楼，不禁感慨系之。这里终究留下了我一些支离破碎的梦。

解放前我来北平报考大学，到过王府井。虽然繁华，但街上的人并不多。东安市场门前挂着用白水粉写在红木牌子上的戏报，一边是今天的夜戏，一边是明天的戏码。吉祥戏院可是个有年头的老园子了。

有人说这条街主要是为东交民巷的外国人服务的，我看不假。那时有英商的惠罗公司，专卖高档百货，解放后改成了新华书店。还有高级皮货店，印度商人开的绸缎店，等等。

没有想到，隔了几年，我竟然在这条街上的117号门牌下呆了三十年。说来也怪，这个门牌号数历经了几个朝代都没有动过。北平沦陷，日伪接收了

国民党的报纸，在这里办了《武德报》。日本投降，国民党又接收过来办了《华北日报》。我们进城，办起《人民日报》，还是117号。后来我发现，连敌伪时期的华北作家协会也是在117号内。什么成舍我、管翼贤等名赫一时的人物，都曾经是这里的主人。而我到这儿来的时候，还是在范长江、邓拓同志主持工作的时代，那时大院套小院，几乎全是平房。长江同志披着一件斗篷常常这里走走，那里坐坐，有时甚至去检查一下食堂的饭菜。

我第一次见到这两位领导人，是在欢迎我们几个新调来报社的同志的招待席上，这也是老解放区的传统，干部调进调出领导上要以酒饭迎送。后来环境变了，取消了。印象最深的是长江同志如同一位政治家，频频站起来向我们祝酒，气度颇不寻常。邓拓同志如同一位儒雅的教授，同我握手时问我的姓名，不是礼貌性的一问而过，而是认真地用手指把我姓名中的三个字，在他自己的手掌心里重写了一遍，一边还点头默记。几年后，我们好些人一起去人民剧场看京剧《智斩鲁斋郎》，隔着老远邓拓同志喊我的名字，我大吃一惊。在这以前，我不是几乎同他没有说上过三五句话吗？

拆了平房盖楼的那年，工地上挖出一尊不大的石人像，有人说这是王府的旧物，听说邓拓同志看过，

似乎并不怎么看重。石像的造型还是很美的，最后由图书馆长谢兴尧先生抬到他办公室去了。一位历史学教授总舍不得让一件古物随便当废砖头给扔掉吧。可是这些琐事后来在“文革”中也被人举为罪证。那个年头令人意外的事情也太多。

工地上也还挖出一口井，有人就附会地说这就是王府井地名的由来。谢教授是四川人，但出身北大，一直在北京执教，熟悉故都掌故，他不以为然。不过在我们机关旁边确有两条胡同，倒是叫大、小甜水井，可见当初这是一块宝地。胡同口有卖早点豆腐浆、杏仁茶、烧饼、焦圈儿的小摊，夜里又卖馄饨、羊杂碎、火烧，方便极了。冬夜，布帐子挡着西北风，坐在那儿喝上一碗热馄饨，别提多舒服了。一到闹公私合营那年，小贩就不见了，于是人们只好在公共食堂里买昨夜的剩馒头夹咸菜吃。

镇反、肃反、三反、五反那阵子工作可真忙，有时忙得似乎顾不上吃饭，就托去食堂的同志给带两个馒头回来。夜里也要加班，当然那时还不兴什么加班费，差不多每天都是钟敲十一点了才回宿舍。那时我住在东单西裱褙胡同，从东单三条穿行最近。有天夜里可碰上《聊斋》里的美女狐仙了。夜深人静，刚走到协和小礼堂附近，树后悄悄走过一名“狐仙”，突然冲我搭讪起来。吓得我一言不发，

光顾往前闯，生怕她追上来。那“狐仙”也许看我样子可怜，终于不曾纠缠，竟自吃吃地笑了，远远地还说着：“怕什么呀！”第二天我与同志们相约结伴而归。结果顺利地通过了协和小礼堂，什么精灵妖怪都没碰上。从此，我也明白了妓女在那时并未绝迹。也许这个世界根本就不会是彻底纯净的。

“大跃进”的年代，我们头脑发热，工作劲头可真足。为了尽快反映各地放“卫星”的大好形势，我们往往睡在办公室里。没有铺盖就把报纸合订本当床褥。有天夜里朦胧入睡，只听得窗外叮叮当当声不绝于耳。第二天醒来一看，王府井大街东西人行道上铺地的钢砖都不见了。原来各单位灵机一动，大炼钢铁时修炼钢炉没有耐火砖，自发地发动了一场人民战争，来了个先下手者为强。连我们单位也凑热闹地抢运回一批砖头。实质上这是一场集体的哄抢和破坏。在没有重新铺设水泥便道以前，王府井大街颇象乡村一条土路，爆土扬尘地保持了好多日子。不知今后有没有人要写王府井的街史，这是很琐细，也很真实的一景。

“文革”期间，这117号里又出入过多少喧赫一时的人物呢！陈伯达、姚文元穿着军装，常常象瘟神似地降临这里，用罪恶的黑手制造人间的混乱和悲剧。有时他们真象演戏，到礼堂来讲话，看看前

排坐的有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便装出狼婆婆的面孔来，阴阳怪气地喊道：“为什么不让工人同志们坐到前面来？我请工人阶级们坐在前排！”害得那些无意间坐在前排的编辑、记者们个个垂头丧气地起身给工人阶级让坐。这种公开地挑动是十分毒辣的，机关生活能有宁日吗？有一次，他竟在大会上点名一位同志：“你的那部电台还不交出来吗？”他一走，马上便贴出“揪出大特务×××”的大标语。现在，我偶然在宿舍院内碰到正领着小孙子散步的这名“大特务”，我开玩笑地问他：“怎么样？你那部电台还不交出来吗？”所得的只能是相对苦笑，或者他反讥我一句：“我那部电台不是你给我装的吗？”不管怎么说，是我们在讥笑那些“大人物”，我们是胜利者，我们笑在了最后。

批判会、斗争会、誓师会、讲用会的口号声往往冲出大楼的窗户，直接传到王府井大街上来。有时甚至会引起好奇的行人伫立观望。当然，声浪当中也会包括我的，现在一想起来便感到无聊和惭愧。数十年来我浪费了多少语言和精力，宝贵的时间白白地象废水一样地流掉了，不仅对自己无益，对于别人也许还会有害，至少是随声附合和起哄么。

“文革”当中有的战斗队神通广大，竟然把我

们敬爱的彭德怀同志也“揪”到机关的礼堂上来。彭大将军身穿一身黑棉制服，显然身体衰弱、疲乏，瘦了。但他头脑还是清醒的，当他看到前排还坐有几名外国人时，他连刚开始的申辩也放弃了。追问逼紧时，他就回答：“不是那样的。真实情况我在这里不能说。”听到这儿，我的心颤动了。

又有一天，我在王府井大街，看到游斗车队过来了，上面正是彭德怀同志。还是那套黑布棉制服，他反背着手，胸前挂着一个名字上打着×的纸牌子，名字倒写着。他又瘦多了。我不知道他心里正想什么？我在想着旧戏里常见的忠臣遭难的故事。

在这条街上，我还看过我的老师陈翰伯同志游斗的场面。他被反绑着双手，头顶纸糊的高帽，耳边还垂下两条纸穗子，活象戏台上的白无常。我笑不出，是含着眼泪看他从这条大街上过去的。我相信，当年“一二·九”在燕京大学从事学生运动时，他一定来过王府井大街，那时他风华正茂，是推翻反动王朝的一名激进青年，怎么会想到三十多年后，自己竟被当作反动派，象一名绑赴刑场的死囚那样游街示众。大街有知，也应该以此为辱。

我毫不夸张地说，多次下夜班，我们的车子在这条街上被无理取闹的“造反派”们拦阻过，一双双罪恶的眼光盯住我们，有人还拿着棍棒在我们的

头上晃来晃去。我也毫无掩饰地说，在这条街上，我亲眼见过有人举着皮带抽打无辜者的场面，那凄惨的痛呼声至今还刺激着我的神经。这条街成了恐怖的通道，成了一条令人不安的街，痛苦的街。

我走在拥挤的王府井大街上。现在商店的门面变得陌生而现代化了，建筑材料多已改装成铝合金型的轻型材料，有的已开始换上了进口的玻璃门窗，报纸上也形容这里象东京的“银座”，是北京的“银座”。我到过东京，逛了“银座”，确乎感到现在有几分相似了。但，我还是不太喜欢这个比喻，正象解放以前我听到天津的法租界被称作“小巴黎”，或在王府井看到英商惠罗公司一样地并不感到是一种荣耀。

这条大街上的王府里的古井究竟在哪里也许没有人感兴趣了，几十年、十几年前在这条街上的一些见闻人们亦将淡漠，而这条街还将变化下去，还要热闹繁华，进一步现代化。无疑的这将是一条欢乐的街，充满了希望的街。但愿它不再有荒诞和眼泪，没有恐怖和令人生厌的声浪从街旁的楼房里冲出来。

1986年1月

• 值 班 •

——王府井轶事

五十年代初，报社接待群众来访的地方一度设在临街的马路上。一排高大的玻璃橱窗业已涂上了白色油漆，繁闹的王府井大街就被隔在窗外。

本来我们有两位同志专职接待来访者，每天晚上和星期日便由编辑们去轮流值班。那还是党中央公布了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决定之后不久，民主空气稍浓，来访者特别多。有时真象医院的门诊部，人们得先填表，然后坐在那里等着叫号。

来访者提出的问题无所不包，有对报纸提意见的，有对国家建设提合理化建议的，有来表扬干部的，有来献出家藏文物和祖传中医秘方的，有来揭发隐匿敌产的，还有家属要求协助寻找革命干部的，等等。当然，也有不少告状和申诉的。我还记得，我曾经帮助一位姓唐的老干部寻找到他失散二十几年的一个女儿。得到好消息那天，他特地坐小

汽车来我这里报个喜讯，讲的都是他当初离家参加革命的往事。又过了些日子，女儿从南方被接到北京来，他又请我去他家吃“团圆饭”。我到底没去，以为这是违反纪律的。现在想来，这算什么呢？去了也许更有人情味。

夜里来访的人究竟少多了。每逢我值班，总是提着个暖水瓶，带上一本书，无人上门我就坐在值班室里喝茶看书。是的，我记得朱生豪翻译的那厚厚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就是在那时候看的。

有年夏夜，一对白胖胖的夫妇来访。男的四十几岁，女的三十多。这次经历如同有人硬往我嘴里塞苍蝇似地令人恶心。男的是个掌柜的，来告店员强奸了他的内掌柜。我怀疑这男的解放前不正道，满嘴油腔滑调，脏字连篇，把他女人“受辱”的细节讲得非常邪乎。那个女的，我怀疑她当年的出身，一旁帮腔时也专讲那细节，甚至要动手解怀……我愈听愈不对劲儿，作为二十几岁的一个小伙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不知羞耻的人。也不知我当时哪儿来的那么一股正气，马上站起来冲他们大喝一声：“别说了！哪有你们这样揭发问题的。”我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也增强了判断是非的勇气，明白地告诉他们，报社不管这类具体纠纷，让他们去找区政府。那女的垂头丧气地说，去找过了，说是没